



垃圾分类“优等生”背后的哀愁

□禾刀

重视垃圾分类与处理,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,而日本在这方面是国际公认的“优等生”。去过日本的人经常会感叹当地街头洁净如洗,几乎看不到垃圾桶,垃圾分类回收水平之高着实令人惊讶。日本今天垃圾分类取得的成就,是因为过去曾饱受垃圾之苦。换句话说,上世纪七十年代东京持续八年的“垃圾战争”,就像是日本后来垃圾分类处理水平提升的一次“激情”前奏。

日本在垃圾处理方面制订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,这是日本垃圾分类回收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。如“建筑垃圾副产物”处理涉及杂草、建筑污泥、金属、石棉等分属20余种法律。“2012年工业废弃物排放量为3.7914亿吨,是家庭垃圾等一般废弃物的8倍以上。曾几何时,日本列岛各地相继发生过多起工业废弃物的非法丢弃事件”,还有一些所谓的“伪装回收”,其动机无一不是为逃避垃圾处理责任。针对此举,日本提高违法成本,祭起惩戒大棒,曾有“伪装回收”企业董事长因事情败露而自杀。

不过,《垃圾去哪儿了:日本废弃物处理的真相》并非是一部替垃圾分类“优等生”歌功颂德之作。作者杉本裕明曾在媒体工作多年,长期致力于环境问题报道。相较于局外人对日本垃圾分类处理成就的纷纷点赞,杉本裕明则将敏锐的新闻视角伸向了日本垃圾处理的多个角落。在这里,杉本裕明看到日本虽然在垃圾分类和处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,也成功导入了一些市场力量,取得了一些成绩,但更多垃圾处理仍旧面临着大量棘手难题,如对核废料的处理除了掩埋似乎还找不到类似变废为宝的良策。

垃圾是放错地方的宝贝。这句西方谚语几乎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头禅。毫无疑问,垃圾中确实有许多可以再利用的“宝贝”,如有的垃圾可以通过再生制造变成新的商品被重新加以利用,有的通过焚烧发电继续发挥余热,有的走向二手市场延续商品的“第二春”……

杉本裕明的调查发现,在日本所有垃圾处理中,再生做得最好的要数聚酯瓶回收,权因聚酯瓶“可以回收再生制造成鸡蛋盒、餐盘、纤维制品、塑料布等物品。围绕聚脂瓶这一资源的回收,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夺战”。换言之,这不是简单的垃圾处理,更像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成熟市场。

另一个做得较好的方面当数二手商品。“2007年二手商品零售业(二手商品店)数量约有7700家、销售额约为3400亿日元,而1997年时只有约4000家、销售额约1000亿日元”,十年间销售额增长三倍多,足见市场潜力之大。杉本裕明在这里所指的二手商品,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旧货市场,里面不仅有过时家电,还有家具厨具等一应俱全,至于二手车,不管有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”,在利益的强力驱动下,商人总是纷至沓来。不过,从杉本裕明的调查看,日本二手商品市场自我消化能力其实极其有限,相当一部分选择出口海外,比如菲律宾这样的东南亚国家。从本质上看,这是垃圾的出口式转移,与饱为人们诟病的洋垃圾并无根本区别。殊不知,二手商品市场并不是垃圾终端的无害化收理,更像是垃圾处理的隐形转移。当二手商品最终完成使用寿命后,依然面临处理问题,只不过污染的不是日本。

焚烧发电是日本垃圾处理绕不开的话题。“2013年日本在运营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约1172座。泡沫经济破灭后,垃圾排放量由2002年度的



《垃圾去哪儿了:日本废弃物处理的真相》
[日]杉本裕明 著
暴凤明 译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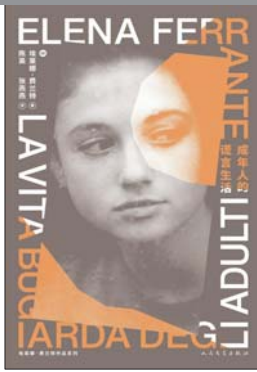
5161万吨减少到2013年度的4487万吨,焚烧量由4031万吨减少到3373万吨,减少近20%”。随着垃圾产量的减少,一些垃圾焚烧厂面临“断炊”的尴尬局面。这里有一个共性问题,即“垃圾焚烧发电受技术和工艺制约,对燃烧产生的剧毒废气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”。还有,由于垃圾焚烧发电电价过高,市场化生存极其艰难。

在杉本裕明看来,除了核废料回收利用几无可能外,食品废弃物的处理到目前亦未找到理想的科学路径。“家庭垃圾中的30%-40%由厨余垃圾构成。燃烧与释放卡路里的比例是平均每公斤600-700卡路里,不到焚烧塑料制品的10%。焚烧处理设施中如果没有厨余垃圾的话,焚烧效率将大幅提升”。按照日本的《食品回收法》规定,厨余垃圾优先是饲料化,其次是肥料化。当二者都难以实现时,可以利用发酵技术实现沼气化处理,以及煤炭化热循环。如果75公里以内没有设施的话,可以用于焚烧发电。不难看出,厨余垃圾走焚烧发电这条路既不科学也不经济,如何为厨余垃圾处理寻找到市场化的科学道路,这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。

杉本裕明并未将视角局限日本本土,他试图从同是垃圾处理“优等生”的德国寻找更多答案。虽然他觉得德国在垃圾处理方面做得不一定比日本好,但德国力推的“扩大生产者责任”(即“要求生产者承担包装容器垃圾的回收与再生责任,从而实现了较高的回收率和机器分拣率”)可资借鉴。杉本裕明相信,让生产者承担回收与再生责任,虽然此举存在一些逻辑瑕疵,但肯定更有助于从源头构建市场驱动的垃圾处理机制。

前面提到日本的垃圾再生利用率很高,但“排名第一的是千叶市,再生利用率为32.3%”,也就是说即便是千叶市,亦有大约七成的垃圾无法得到再生利用。“优等生”尚且如此,其他就不用说。如此说来,相较于社会进步带来的巨大物质满足,人类在垃圾处理方面倾注的热心远远不够,投入的精力亦微不足道。尽管媒体频频发出严厉的警告,但相较于市场铆足劲研发新商品的势头,垃圾回收处理特别是循环利用进展依然十分有限。

透过杉本裕明对垃圾分类处理“优等生”的调查不难发现,垃圾处理不仅需要巨额资金,还需要持之以恒寻找新的科学路径。某种意义上,垃圾处理之所以困难,是市场对环境资源价值错判的恶果。还有一点需要指出,本书让读者看到了垃圾处理极其沉重的一面,其实还有另外很大一部分本书并未深入揭露,那就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洋垃圾的重要输出国,只不过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。



新书秀场

《成年人的谎言生活》
[意大利] 埃莱娜·费兰特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埃莱娜·费兰特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之后的最新一部作品,聚焦于出身那不勒斯中产家庭的女孩乔瓦娜的青春和成长。在父亲离家两年前,十二岁的乔瓦娜偶然听到父亲安德烈亚对母亲说自己很丑,越来越像父亲一直嫌恶的妹妹维多利亚,这句话驱使乔瓦娜第一次走到那不勒斯下城,直面父亲抛在身后的卑贱过往。在下城,乔瓦娜识破了姑姑实则狗血的爱情神话,在教堂认识了光芒四射的青年知识分子罗伯特,也开始带着日益残酷的冷静面对父母婚姻的破裂、浮夸的友谊,还有暗礁遍布的成人世界。

《约翰·伯格的三重生命》
[美]乔舒亚·斯珀林 著
世纪文景 | 上海人民出版社

约翰·伯格是战后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作家之一。作为小说家,他在1972年获得布克奖,并将一半奖金捐给黑豹组织。作为电视主持人,他以《观看之道》改变了我们看艺术的方式。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,他捍卫了全世界工人、移民和被压迫者的权利和尊严。他在1953年写道:“我远没有把政治拖进艺术,而艺术把我拖进了政治。”直到2017年1月去世,他仍然是一位革命家。《约翰·伯格的三重生命》通过第一手的、未发表的访谈和最近公开的档案资料,在诸多争议性的时刻之下挖掘出一个具有非凡复杂性和韧性的人物,将他的众多面孔汇聚在一起,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重新带回他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图中。

《东京贫困女子》
[日]中村淳彦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村淳彦是一位20多年一直致力于女性贫困问题采访的记者,以《在贫困中呻吟的女性》为在日本《东洋经济新闻》开辟专栏,历时三年左右,收集了几十位女性亲口讲述的故事,最后集结成书。她们是在入学典礼前被迫进入风俗行业的花季少女,是付不起医疗费用的日本东京大学硕士,是出身名校却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让孩子退学的母亲……她们不是数据,不是案例,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。

《李银河谈亲密关系》
李银河 著
博集天卷 | 湖南文艺出版社

为什么选择单身的人越来越多?谈恋爱时要不要考虑对方的家庭背景?我们该如何看待婚前同居?在面临家庭暴力的时候,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?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理想的亲密关系是:我们两个人愿意在一起,虽然表面上看,我们的关系是一种归属、一种约束,但是这种约束和归属符合我的自由意愿,我是自愿进入的,没有感觉到违背内心愿望的压抑和束缚。本书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,探讨每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遇到的问题——经济独立、婚恋焦虑、婆媳关系、家庭暴力,深入剖析54个社会热点话题,旨在带领读者打破亲密关系的刻板印象,建立爱与性的全新认知。

语言永远在追赶生活

□谈骁

我读六年级时,学校组织了一次毕业春游,目的地是十几里之外的伍家河大桥。途中经过一个叫“铁索口”的地方,两边是高耸的石壁,顶端几乎合拢,只留一线天光;石壁间有小河,河边的路极窄,仅供一人通行。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,兴奋又惊慌地从石壁间走过,头上偶尔落下水珠,惹得他们不时地惊叫。



《说时迟:谈骁诗集》
谈骁 著
鹿书 | 武汉大学出版社

如果要追溯,我写作的源头就在铁索口仰头的那一刻,我的写作路径也隐喻式地包含在那声惊叹之中。人生正在经历,此刻转瞬即逝,我是一个迟钝的感知者:等到演出谢幕,才想起为之鼓掌;等到火焰熄灭,才能感受到火焰的温暖。要找到形容他们的词语就更晚了,《说时迟:谈骁诗集》这本书取名“说时迟”,缘由也在这里。

我迟到的语言,只能围绕着我置身其

中的生活,我目睹的鲜活而具体的人——无尽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确实与我有关,可是,在写作中,他们至多是我遥望的终点;我的出发点,始终是我的立足之地。沃尔科特曾有一个极端的表述:“一个诚实的诗人,方圆三十英里就是他写作的界限。”这样的“方圆三十英里”我有很多:童年的鄂西山地,少年的清江两岸,我如今生活的野芷湖边——是这些地方,让我的写作成为可能;而如果我的写作难以为继,我也会自知之明:并非我经历的不够丰富,而是我还没有建立与之相对应的感受,没有找到配得上这种经历的词语。

这些年来,我发出的声音,已逐渐变得含混:除了睁眼看到世界的“啊”,还有建立认识后将信将疑的“哦”,以及发现认识的有限时的“唉”。这种含混是诗必须有的容量,也是我必须经历的人生。我希望这样的人生尽可能深刻一些,不是浮光掠影地“我来过”,而是倾注了热情的“我在这里”。我也希望我写的诗尽可能地深刻,不是思考的深刻,而是体验和感受的深刻。

我愿意宣称我的诗都是“感受之诗”,受益于感受的真诚,也要正视它可能的无效:太实在了,无法化实为虚;太传统了,只有认识学或传记学的意义,而缺少语言学上诠释的空间;太缓慢了,语言永远在追赶生活。这是这本书,也是我的诗歌写作显而易见的缺点,但在这缺点被更诚实的感受、更洞察的眼光、更具消化力的胃有效纠正之前,我愿意这缺陷更大一些:更实在,更传统,更缓慢——说到底,是更忠于经验和感受,更“个人”。就像一个气球,只要它不破碎,我都愿意相信它的承受力,我会鼓起力气和勇气,朝里面吹气。诗可能是那个破碎的气球,但它首先是气球里面带有个人印记的空气。